

# 量詞單一起源假說中動物個體量詞的爭議： 漢語、泰語與周邊語言的對比 \*

梁永平 杜氏金剛 何萬順 \*\*

## 摘要

在亞太地區諸多的量詞語言中，其量詞的最初起源是漢語族（Sinitic）還是侗台語系（Kra-Dai），學界頗有爭議。文獻中西方學者較多反對漢語族為起源而支持侗台語系，而中國學者則相反。Her & Li（2023）檢視了反對漢語族的六項理由，並逐一反駁，論證北方漢語才是量詞的發源地。支持侗台語系的理由之一是，漢語缺乏區分人類與動物的個體量詞。在此爭議的背景中，本文針對動物個體量詞提出更多支持漢語族的證據，以漢語中專屬動物的個體量詞「隻、頭、尾、匹」為中心，對比漢語、泰語與周邊語言，驗證漢語動物個體量詞是各語言中最豐富的，且受漢語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也多於受侗台語系傣語支（Tai）影響的量詞語言，因此就此項證據而言，漢語族較傣語支更可能是亞太地區量詞的起源。本文並提出基於數詞的新證據：傣語支在歷史上從漢語借入數詞，又基於數詞與量詞的緊密關係，傣語支從漢語借入量詞的可能遠大於輸出量詞給漢語。

**關鍵詞：**量詞單一起源假說、動物個體量詞、數詞、漢語、侗台語

## 一、前言

漢語是典型的量詞語言，當以數詞量化名詞時，量詞（classifier）是必須出現的詞類，而量詞可以根據語意細分成個體量詞（sortal classifier）與計量量詞（mensural classifier）兩個次類。個體量詞選擇屬於特定語意類別的名詞，並指定共現名詞指涉的個體為計數單位。計量量詞則表達特定的量值作為計量單位。可以從以下兩個實例來看：(1)a 中的量詞「朵」只能跟表達具有花朵形狀之物的名詞共現，數詞「三」所計算的是花的個體，所以「朵」是個體量詞。而(1)b 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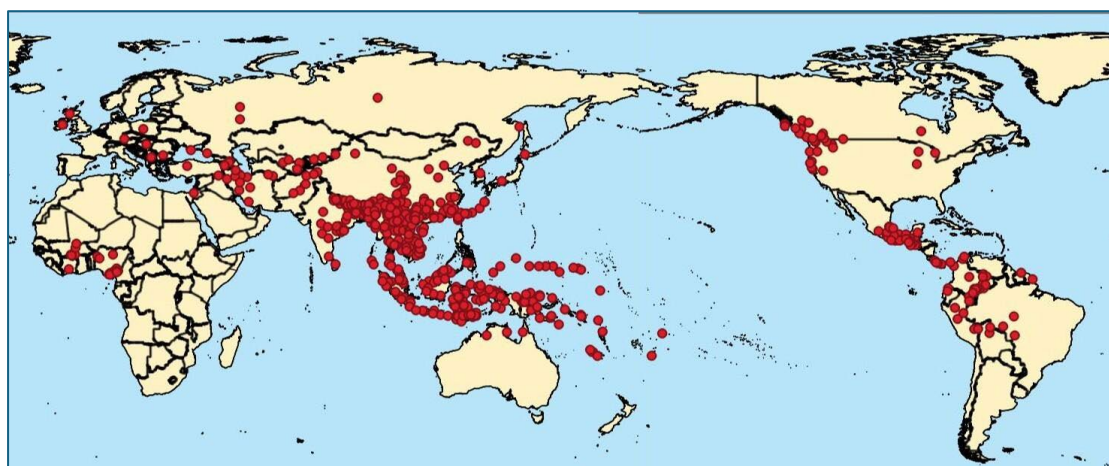
\* 本文作者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改進意見，本文論證得以精進，也衷心感謝洪惟仁、吳瑞文與程俊源三位先生在古漢語音韻的相關問題上提供寶貴的專家指導，但作者文責自負。本文的研究且獲得下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支持，也一併致謝：108-2410-H-029-062-MY3與111-2410-H-029-009-MY3。

\*\* 梁永平為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杜氏金剛為越南河內國立師範大學國際教育培訓學院副主任，何萬順為通訊作者，現任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林南&蒲慕蓉講座教授以及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

的量詞「箱」對共現名詞的語意並沒有特別要求，只是表達一個箱子能裝的量作為數詞計量的單位，所以「箱」是計量量詞。

- (1) a. 三朵玫瑰
- b. 三箱玫瑰

單就語意功能來看，計量量詞是所有使用數詞的語言都有的，因為只有計量量詞有能力提供計數單位，協助數詞量化不可數名詞。<sup>1</sup>反之，個體量詞並沒有創造新的計數單位，只是指定原本就存在於可數名詞語意中的個體為計數單位（Cheng & Sybesma 1999），且個體量詞是透過與量化名詞共享一些語意特徵，凸顯名詞所指涉個體的一些本質屬性（Her 2012），藉此標記個體作為計數單位；因此，嚴格來說，個體量詞並不是必要的詞類，所以全世界七千多種語言中大多數沒有個體量詞。在 Her & Li（2023）的調查中，發現文獻中所記載的 713 個量詞語言，其地理分布如圖（一）所示。



圖一 713 種量詞語言的分布

學界公認量詞是東亞和東南亞語言的重要特徵（Greenberg 1990 [1974]；Aikhenvald 2000），且大部分量詞語言也都分布於此及鄰近地區，尤其是漢語族（Sinitic）、苗瑤語系（Miao-Yao 或 Hmong-Mien）、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侗台語系（Kra-Dai）<sup>2</sup>、藏緬語族（Tibeto-Burman）及印度-雅利安語支（Indo-Aryan）

<sup>1</sup> 量詞語言和非量詞語言在計量詞類的句法特性上有所不同。以英語為例，在 *three glasses of water* 中，*glass* 發揮了計量量詞的功能，協助數詞 *three* 量化不可數名詞 *water*。但 *glass* 與 1 以上的數詞共現時必須加複數標記 *-s*，且必須透過介詞 *of* 才能與該名詞結合，這些都是英語名詞的特性。這顯示英語的計量詞類是名詞，而漢語的量詞是獨立於名詞的詞類（Tang & Her 2019）。

<sup>2</sup> 侗台語系過去常被稱為「壯侗語系（Tai-Kadai）」，但該名稱認定「傣語族（Tai）」和「仡央語族（Kadai）」為平行分支，這並不受較新的研究支持（Ostapirat 2000）。而侗台語系包含一些被學界普遍接受的分支，如傣語支（Tai）、仡央語支（Kra）、黎語支（Hlai）、侗水語支（Kam-Sui）等。這些語支也被普遍認為組成侗台語系下的一些二級分類，即語族，但哪些語支組成哪些語族尚有爭議（如：Morev 2000；Chamberlain 2016；Chen 2017）。壯侗語系分類法的主要問題在於黎語支的歸屬：提出該分類法的 Benedict（1942，引自 Ostapirat 2000）認為黎語跟仡央語支語言形成「仡央語族」，但他用以支持仡央語族存在的同源詞，大部分在傣語支語言中也存在，所以仡央語族是否成立備受質疑（Ostapirat 2000）。目前大部分的侗台語系分類法，都不認為黎語支和仡央語支形成有親緣關係的單位（Chen 2017）。侗台語系（Kra-Dai）的名稱中，Kra 指仡央語支，

內。Her & Li (2023) 將這六個語言族群簡稱為 SMATTI，並發現在全世界 713 個量詞語言中，有 310 個屬於 SMATTI，亦即將近一半（43.5%）的量詞語言集中於這六個語言族群。

該文進而描述了亞太地區量詞語言的分布情形：SMATTI 區域內最密集，越往外量詞語言越少。因此基於量詞語言的分布情形，Her & Li (2023) 提出亞太地區量詞語言的單一起源假說：亞太地區除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尚缺乏資料無法確認外，其餘所有地區的語言之所以產生量詞都來自語言接觸，歷史上只有一個語言族群獨立發展出量詞系統。<sup>3</sup>

至於是 SMATTI 中哪個語言族群最早發展出量詞系統，最有可能的選擇是漢語族或侗台語系。在 Her & Li (2023) 的調查中，這兩個語言族群的量詞語言比例在 SMATTI 中是最高的：所有漢語族語言都有量詞，侗台語系則是超過一半的語言 (50/94, 53.2%) 有量詞，且實際比例應該更高，只是因資料有限而被低估，而在可見的文獻中，沒有任何侗台語言是沒有量詞的。另外，他們也討論了其他四個語言族群的量詞來源，並得出其量詞的產生都來自語言接觸。最後，漢語族和侗台語系也是文獻中呼聲最高的量詞起源：支持侗台語系下的傣語支 (Tai) 獨立發展出量詞並傳給漢語族的學者有：Jones (1970)、Hashimoto (1977)、Erbaugh (1986)、Adams (1991)、Peyraube (1991)、李若暉 (2000)、Huang (2013) 等。支持漢語族獨立發展出量詞系統的學者有：黃載君 (1964)、張公瑾 (1978)、梁敏 (1983)、Wang (1994)、Morev (2000)、Behr (2009)、步連增 (2011b)、Her & Li (2023) 等。

Behr (2009) 與 Huang (2013) 分別綜整了相關文獻，系統性地歸納出六項反對漢語作為量詞系統起源的理由，支持侗台語為起源：一、上古漢語尚未有量詞；二、漢語中缺乏動物類個體量詞；三、在歷史發展上漢語量詞的詞序並不穩定；四、原始藏緬語沒有量詞；五、南方漢語中的個體量詞多於北方漢語；六、東南亞語言中個體量詞系統最為發達的是侗台語言。Her & Li (2023) 對其一一反駁：一、甲骨文已有少數計量量詞，金文已可見個體量詞；二、漢語有動物類個體量詞「隻、頭、尾」等；三、漢語量詞詞序自古以來皆為「數詞>量詞」，十分穩定；四、原始藏緬語沒有量詞的事實，與原始漢語有無量詞無關；五、漢語族內個體量詞呈現南多北少的現象，可歸因於北方漢語之「阿爾泰化」；六、在東亞語言中個體量詞系統最為發達的是漢語，且並不亞於侗台。該文進而主張量詞起源於上古北方漢語，後向四方傳播，影響南方漢語及其他周邊語言族群。

從上述說明可見，亞太地區語言量詞系統的起源是一個宏大的議題，本文的目的並非在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在動物個體量詞這項爭議上，本文將提出清晰的證據顯示，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不僅在數量上多於侗台語，而且在產生時間上也早於侗台語；更重要的是，侗台語中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極可能是借自上古漢語。因此，亞太地區量詞系統的起源較可能是漢語。本研究從漢語動物個體量詞「隻、頭、尾、匹」等出發，進而對比漢語和傣語支中最優勢的泰語，接著再對比分別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之周邊語言，以論證就動物

---

Dai 指傣語支 (Tai)，這兩者是侗台語系中分布範圍最廣，語言數量最多，政治文化地位最高的分支，因此用以代表侗台語系；但該名稱並不宣稱該語系下只存在這兩個分支。侗台語系內部分類的爭議和本文主題無關，因此並不細論。

<sup>3</sup> Thomason (2001:1) 將「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 定義為「同一時空下使用多種語言」(the use of more than one language in the same place at the same time)。漢語與侗台語自古即有接觸，爭議在於量詞最先起源於漢語還是侗台語，然後經由語言接觸影響其周邊語言。

個體量詞而言，漢語族作為亞太地區量詞起源的可能性確實較高。本文最後也將從數詞系統的角度提出另一項有力的證據，支持量詞起源於漢語而非侗台語。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對比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使用情形，以論證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較發達。第三節轉而比較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的量詞語言，確認漢語和泰語在動物個體量詞上的差異也存在於這兩類語言中，進一步鞏固前節的立場。第四節論證傣語支語言有許多數詞借自漢語，基於量詞與數詞的緊密關係，傣語支很可能同樣從漢語輸入量詞；反之，由傣語支向漢語輸出量詞是極不可能發生的事。第五節總結全文。

## 二、動物個體量詞：漢語和泰語

跨語言調查顯示，有生性（animateness）是量詞系統最基本的分類依據，基本上每個量詞語言都會以不同個體量詞區分人類／非人類名詞或生物／非生物名詞（Adams & Conklin 1973）。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假設，有生性是一個量詞系統最早產生的語意區別（DeLancey 1986）。隨著量詞系統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個體量詞產生，它們的語意特徵也隨之增加，以對名詞做更細緻的分類。非人類類別或生物類別的進一步分類自然會產生動物類別，因此量化動物名詞的個體量詞也應是量詞系統發展過程的早期產物。

漢語跟泰語都是量詞系統發達的語言（Her & Li 2023），但漢語的個體量詞卻被一些學者描述為缺乏人類／非人類或生物／非生物之分（Erbaugh 1986；Huang 2013）。這樣的論點似乎在量化人類的個體量詞上成立：泰語在這方面有非常細緻的區分，如 *khon* 泛用於所有人類，*ʔonj* 用於王室成員、高僧等社會地位高的人，*ru:p* 用於僧侶、道士等宗教職務人員，*na:i* 則用於警察、軍人等公務人員（DeLancey 1986；番秀英 2009）。相比之下，漢語在口語中量化人類名詞時，基本上只使用通用個體量詞「個」，而該量詞並不限於量化人類（張楨、王曉哲 2014）。但是，若說漢語完全沒有只量化人類的個體量詞，也不符合事實，因為漢語確實有「位、名」等專門用於人類，且也在該範圍內進一步細化分類的個體量詞，只不過使用範圍通常限於書面語或正式場合，如「位」用於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如「一位老師、一位學者」，「名」用於職業從事人員，如「一名演員、一名建築師」等（番秀英 2009）。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轉而聚焦在量化非人類的個體量詞，尤其是動物個體量詞上，<sup>4</sup>我們會發現，漢語不僅有動物個體量詞，數量還比泰語豐富（番秀英 2009；張楨、王曉哲 2014）。本節欲詳細討論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使用情形差異，以對這個議題做出準確的描述。本節的討論分四個小節：（一）漢語和泰語動物個體量詞的數量和使用範圍，（二）動物個體量詞的定義，（三）論證泰語動物個體量詞 *tua* 乃源自上古漢語「頭」，（四）比較漢語和泰語量詞系統的演變過程差異，以支持漢語擁有原生量詞系統。

---

<sup>4</sup> 非人類個體量詞除了動物個體量詞，還包括無生物個體量詞，這在漢語和泰語中數量都非常豐富。這類個體量詞主要根據物體形狀再進一步細分，如量化圓塊狀物體的「顆」／*lu:k*，量化扁平而薄的物體的「片」／*p'æ:n* 等（番秀英 2009），符合跨語言的觀察：形狀是量詞系統繼有生性後，第二常見的分類標準（DeLancey 1986）。另一類較有趣的非人類個體量詞，其量化範圍跨越動物與無生物的邊界，如漢語「隻」和泰語 *tua*。我們在第二節（二）會詳細討論這類例子。

## (一) 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

根據番秀英(2009)、張穎、王曉哲(2014)與 Her & Li (2023) 的描述,漢語有多達五個常用的、可以量化動物名詞的個體量詞:「隻、頭、條、匹、尾」。其中「隻」是所謂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 (general animal sortal classifier),基本上可以和所有動物名詞共現;「頭」用於量化大型動物,如牛和大象;「條」用於量化長條形動物,如蛇和魚;「匹」用於量化馬、驢等可做為交通工具的動物;「尾」是量化範圍最狹窄的動物個體量詞,只能量化魚。如果我們把漢語歷史上出現過的動物個體量詞也納入討論的話,漢語還會再多出四個動物個體量詞:商代使用量化狗和羊的「𠂔」(Chen 2006, 引自 Huang 2013) 和量化馬的「丙」(Erbaugh 1986),<sup>5</sup>周代則使用「足、角」量化牛和羊 (Erbaugh 1986)。由此可見,漢語中確實存在數量不少的動物個體量詞。

另一方面,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比漢語少得多,番秀英(2009)只列出三個: tua 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可以用於所有動物名詞,是泰語中最古老的量詞之一 (DeLancey 1986)。另外,基於泰國文化對大象的尊崇,泰語使用多個個體量詞量化不同社會地位的大象:野生大象使用 tua;人工飼養的大象使用 te'ua:k,字面語意為「繩子」;皇家飼養的大象則用 te'a:ŋ。其中最後一個量詞其實就是泰語名詞「大象」,亦即泰語將該名詞置於量詞的位置以量化該名詞自身,這種與量化名詞語音形式相同的量詞稱為迴響型量詞 (echo classifier),在泰語中十分常見 (番秀英 2009), Jenks (2011:94) 宣稱有超過五百個。而有學者觀察量詞系統在漢藏語系諸多語言的發展過程,認為迴響型量詞的存在顯示該語言的量詞系統未臻成熟還在發展階段 (蔣穎 2009)。因此,漢語中已不具迴響型量詞的事實,也有利於漢語作為量詞的起源。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確實勝過泰語,分類也更加細緻:雖然兩個語言都有通用的動物個體量詞「隻」/ tua,也有專門量化一種動物的個體量詞(漢語「尾」-魚,泰語 te'ua:k-大象),但在這兩個極端的量化範圍之間,漢語量詞還根據動物的形狀、尺寸、社會功能劃分出適中的量化範圍。因此,漢語的量詞系統在量化動物這方面的確較泰語發達。

## (二) 「動物個體量詞」的定義

如果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比泰語還發達,為何會有學者認為漢語沒有動物個體量詞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對動物個體量詞的定義不同:如「條」嚴格說來不是動物個體量詞,因為它在動物範圍內只能量化長條形的動物,如蛇和魚;另一方面,「條」主要的量化對象是細長而柔軟的無生物,如繩子、褲子。可見「條」的語意特徵其實是長條形和柔軟性兩項,而不包含有生性;一些動物能被「條」量化是因為它們的形狀,而不是因為它們是動物。因此,如果我們將動物個體量詞定義為帶有生性和非人類性的語意特徵,「條」就必須被排除在外。同樣的道理,商代的個體量詞「丙」可能也不是動物個體量詞,因為 Chen (2006, 引自 Huang 2013) 的研究指出,該個體量詞的量化對象包含馬和車;考慮到這兩者都

---

<sup>5</sup> 商代是否存在個體量詞尚有爭議。一些較新的研究如戶內俊介(2024)認為,甲骨文中的所謂個體量詞實為計量量詞或普通名詞,只有少數名詞如「人」可能已開始語法化的歷程,但還不足以形成個體量詞。

有交通工具的功能，但車是無生物，「丙」的語意特徵應為「具有交通工具的功能」，並不包含有生性。

如果我們採取這樣較嚴格的動物個體量詞定義，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確實會下降，但仍然比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多。再者，同樣的標準其實也會否定泰語中量化皇家大象的迴響型量詞 *tc'a:n* 的動物個體量詞身分，因為迴響型量詞其實並沒有將名詞分類的功能（番秀英 2009），只是將量詞系統未分類的名詞複製後填入量詞的句法位置，以協助數詞量化名詞而已。換言之，迴響型量詞量化的名詞在泰語使用者的認知中其實屬於同一類別，即「未歸類名詞」，其成員並不限於有生物，所以迴響型量詞不應分析為動物個體量詞。

另外需注意的是，「動物個體量詞只能量化動物」的標準如果嚴格遵守，恐怕會排除一些文獻中非常經典的動物個體量詞。如漢語「隻」和泰語 *tua* 都被描述為通用動物個體量詞，但它們都可以量化一些無生物：「隻」可以量化成對物品中的單一物件，如「一隻襪子」；<sup>6</sup>*tua* 可以量化被視為有身體形狀的物體，如桌子、椅子、衣服、褲子、娃娃等（番秀英 2009）。為避免將這些代表性的動物個體量詞排除出我們的研究範圍，我們必須引用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的概念：原型理論認為詞劃定的範疇並不是透過必要充分特徵定義的，而是透過原型特徵定義的。原型是一個範疇的典型成員，一個物體只要跟原型享有部分原型特徵，而不需共享所有原型特徵，就可以成為該範疇的成員。一個成員與原型享有越多原型特徵，它就是該範疇越典型的成員（Kövecses 2006；番秀英 2009）。因此，我們可以將動物個體量詞定義成「以有生性和非人類性為原型特徵的個體量詞」，如此就能成功將「隻」和 *tua* 納入動物個體量詞的範圍，同時又能解釋它們能量化一些無生物的事實：因為那些無生物相對於有生物，並不是「隻類」和「*tua* 類」的典型成員。<sup>7</sup>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動物個體量詞採取寬鬆還是嚴格的定義，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跟分類細緻度都勝於泰語。因此，如果以動物個體量詞的有無來判斷一個語言是否有原生的量詞系統，漢語獨立發展出量詞的可能性是勝過泰語的。

### （三）泰語動物個體量詞 *tua* 的起源

---

<sup>6</sup> 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501>，瀏覽日期：2025年3月7日。

<sup>7</sup> 從歷時演變的角度來看，漢語量詞「頭」符合原型理論對動物個體量詞的描述：「頭」在兩漢時期的量化範圍僅限於牛、羊等大型牲畜，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大幅擴展，包含狗、豬等小型家畜，熊、象、鹿、兔等各種尺寸的野生動物，雞、魚等鳥類和水生動物，成為通用於所有動物的個體量詞。同一時期，「頭」也能量化無生物，如蠶繭、樹木，以及人類（王彤偉 2005）；其中「頭」量化人類的用法到了唐代進一步鞏固（王彤偉 2005；黃從嘉等 2025）。以上的演化歷程可以做以下分析：「頭」最早的量化範圍是大型牲畜，爾後以這一類別為原型，擴展其量化範圍至非原型的其他動物；待動物這一類別成為「頭」穩定的量化對象後，又以該類別為原型，將計算對象擴展至非原型的無生物和人類。

有趣的是，本文雖欲以原型理論保留「隻」做為動物個體量詞的身分，但「隻」在這一點上反而有些爭議。這是因為有一派分析認為，做為量詞的「隻」一開始就有兩個：一個量化雞，一個量化成對的玉器。爾後，這兩個量詞「隻」的量化範圍各自從原型擴展至非原型，但並沒有從動物延伸至非動物的情況（王曉燕 2021）。關於量詞「隻」的數量的爭議，本文無意解決；但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替代理論並沒有否定本文認為「隻」是動物個體量詞的立場。這是因為，倘若量化動物的「隻」跟量化成對物中單一物件的「隻」是不同的量詞，那後者就更不能用以挑戰前者做為動物個體量詞的身分了。

在傣語支的語言中，通用的動物個體量詞是 *tua*，在原始傣語中可構擬為 *\*tue*，是七個最古老的量詞之一（DeLancey 1986）。在現代泰語中的 *tua*，在語意範疇上與官話中的「隻」十分類似，可以用於所有的動物名詞。然而，文獻中從未有學者認為原始傣語 *\*tue* 可能借自古漢語的「隻」；但 Manomaivibool (1976) 明確主張 *\*tue* 借自古漢語的「頭」*\*d'u*。根據 Morev (2000) 的研究，原始傣語在公元第一千年前半與漢語發生密集接觸，而原始傣語的個體量詞 *\*phen* 乃借自漢語「片」，並無爭議（DeLancey 1986），可見原始傣語已有借自漢語的個體量詞，而且泰語中數詞二到十都是借自漢語（Suthiwan & Tadmor 2009）。

在討論原始傣語 *\*tue* 借自上古漢語「頭」在語音演變上的可行性之前，我們先討論語意面上的正當性。在兩漢時期（202BC-220AD），「頭」作為個體量詞只能計算牛羊類動物，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AD）量化範圍擴大，成為有生名詞的通用個體量詞，因此類似於現代泰語的 *tua*，能計算所有的動物（王彤偉 2005）。事實上，雖然官話中的通用動物量詞已被「隻」取代，但在某些漢語方言中，「頭」仍維持了這個地位。粵方言開建話中，表人的名詞使用通用量詞「人」，例如，「一人人、兩人學生」，非人類生物使用「頭」，例如，「一頭魚、一頭雞」等；而在粵方言賀州本地話中，「頭」的量化範圍也包括了表人的名詞，例如，「一頭學生、一頭魚」（張慶文、鄧思穎 2014:734-745）。

在語音上，原始傣語 *\*tue* 借自上古漢語「頭」則尚有爭議。DeLancey (1986) 指出，*\*tue* 的語音形式本身並非明確：傣語支語言中北傣語分支（Northern Tai）的資料構擬出的語源是濁音 *\*d*-開頭，中傣語分支（Central Tai）和西南傣語分支（Southwestern Tai）構擬出的語源卻是清音 *\*t*-開頭。李方桂（2011 [1977]）將原始傣語動物個體量詞構擬成 *\*tue<sup>A1</sup>*，但也提到北傣語分支語言的聲調都是 A2，顯示其語源應是 *\*d*-開頭。這顯示原始傣語動物個體量詞也可以構擬成 *\*due<sup>A2</sup>*。

在漢語中「頭」作為個體量詞首見於西漢（王彤偉 2005），屬上古漢語時期（魏培泉 2000）。「頭」在上古漢語中和「豆」同音，而李方桂（2011）將上古漢語「豆」構擬為 *\*dug* 去聲，所以上古漢語「頭」也應該是 *\*dug*。如果上古漢語「頭」*\*dug* 跟原始傣語 *\*due<sup>A2</sup>* 都是 *\*d*-開頭，那後者來自前者的可能性便大增了。至於「頭」*\*dug* 的韻母 *\*-ug* 如何變成原始傣語 *\*due<sup>A2</sup>* 的 *\*-ue* 乃至現代泰語 *tua* 的 *-ua*，丁邦新（2020）發現上古漢語的詞與原始傣語的詞有許多系統性的語音對應，其中上古漢語 *\*-g* 韻尾對應到原始傣語中都會丟失，如「豆」在上古漢語中是 *\*dug*，到原始傣語變成 *\*thue<sup>B1/B2</sup>*；「藕」上古漢語中是 *\*ɲug*，到原始傣語變成 *\*ɲəu<sup>C2</sup>* 等。李方桂（2015 [1971]）也發現泰語常把上古漢語侯部（*\*-ug*）字對應為 *ua*，如「豆」泰語為 *thua*，「漏」泰語為 *rua* 等。<sup>8</sup>這些對應模式都支持上古漢語「頭」*\*dug* 變成原始傣語動物量詞 *\*due<sup>A2</sup>* 乃至泰語動物量詞 *tua* 的可行性；可能的演化歷程如下：*\*dug > \*due<sup>A2</sup> > \*tue<sup>A1</sup> > tua*。<sup>9</sup>

以上討論可為亞太地區量詞系統起源的議題帶來重要啟發：如同 DeLancey (1986) 所言，如果原始傣語中 *\*tue*/*\*due* 這麼基本的個體量詞都來自漢語的話，

<sup>8</sup> 感謝洪惟仁教授提供此項文獻（個人通訊，2025/6/24）。

<sup>9</sup> 以上關於原始傣語及漢語上古音詞源的討論，尤其是上古漢語「頭」*\*dug* 至泰語 *tua* 的可能演化歷程係得自與吳瑞文的個人通訊（2025/6/25），特此致謝。

泰語的量詞系統並非原生，而是借自漢語的可能性就更高了。<sup>10,11</sup>

#### (四) 個體量詞的量化範圍與演變

在量詞系統的發展過程中，一個量詞的量化範圍可能會從它今天所劃定類別的典型成員擴展到非典型成員，這種量化範圍的擴張是漢語量詞系統發展歷程的整體規律 (Erbaugh 1986)：在商周時期，個體量詞的數量很少，而且都是用於量化特定的、具體的物體，而不是抽象類別的成員，如「枚」只能量化竹子。另外，此時被個體量詞量化的往往是有高價值或重要性的物品，如馬、珠寶、弓箭、車等等。隨後，量詞系統的量化範圍逐漸延伸至日常用品，單個個體量詞的量化範圍也逐漸轉為更大、更抽象的類別的成員，如「枚」的量化對象從竹子到所有的樹，到木製品，一直到六朝時成為無生物的通用個體量詞 (Huang 2013)。Erbaugh (1986) 調查漢語兒童習得量詞系統的過程，也觀察到類似的發展模式：兒童一開始只會用專用個體量詞 (specific sortal classifier) 量化非常具體的東西，然後逐漸用來量化成人用法中的原型，然後再擴展至非典型物體，如一開始只用「張」量化圖畫紙，之後才逐漸擴大使用範圍至所有紙，乃至所有平面形的物體，如照片。可見這種個體量詞從專用到通用，量化範圍從小到大的趨勢，應該有一些認知上的基礎。

然而，泰語量詞系統的發展卻呈現完全相反的方向：在 DeLancey (1986) 構擬的原始傣語個體量詞清單中，最古老的四個個體量詞都負責量化較大、較抽象類別的成員，如 \*tue 量化有生物，\*sen 量化細長物，\*oŋ 量化人類等等。隨著量詞系統的發展，這些個體量詞再增添新的語意特徵，對名詞做出更細的劃分，如泰語的人類個體量詞分裂為 khon 和?oŋ，前者是無標的人類個體量詞，後者則用於社會地位高的人。這種從通用到專用，量化範圍從大到小的趨勢，似乎更符合跨語言調查的結果：如第二節開頭所述，Adams & Conklin (1973) 的調查顯示每個量詞語言都會區分有生性，這包括一些最簡單的量詞系統，它們可能只有兩個個體量詞，而這兩者便將名詞劃分成人類／非人類或生物／非生物，這些量化範圍都是抽象的類別，而不是具體的物件。

---

<sup>10</sup>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本文認為泰語的量詞系統借自漢語，但這並不代表泰語所有的量詞都來自漢語。DeLancey (1986) 構擬的原始傣語最古老的個體量詞中，沒有證據顯示 \*tue 以外的個體量詞是從漢語借入的。因此，我們認為原始傣語對量詞系統的借用雖然包含一些借詞，但整體而言是所謂的刺激擴散 (stimulus diffusion; Weidert 1984)，也就是先受到外界刺激而產生量詞這一詞類，再使用原生的詞發展出個體量詞。傣語支中原生量詞的產生過程已超過本文的討論範圍，因此我們並不細論，但一般認為量詞主要是從名詞演變而來，這點在漢語和泰語中並無差別，如「頭」原本就是名詞，泰語則有一個個體量詞 hua 也是從表頭的名詞而來，但量化的對象則是圓形的蔬菜或根莖類植物，如洋蔥、芋頭等 (番秀英 2009)。

<sup>11</sup> 原始傣語 \*tue/\*duc 來自漢語「頭」的分析，能從其他傣語支語言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獲得旁證：寮語 to/tao、壯語 tu、布依語 tu 都明顯和泰語 tua 有同源詞關係 (番秀英 2009)。有趣的是，番秀英提供的資料顯示，屬侗水語支的侗語和水語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分別為 tu 和 to，似乎也與傣語支的動物個體量詞有同源關係，暗示侗台語系可能更早就從漢語借入「頭」了。不過，Morev (2000) 指出侗水語支的量詞結構語序是「數詞-量詞-名詞」，且沒有曾經轉換語序的跡象，應該是一開始獲得量詞時就採用這個語序。這個語序相較於傣語支採用的「名詞-數詞-量詞」語序在漢語中較晚出現，所以傣語支和侗水語支應是先後獨立從漢語借入量詞，只是剛好都借用「頭」做為通用動物個體量詞而已。

為何漢語和泰語會有如此不同的演化模式呢？我們認為這表面上的差異其實可以統一成同一個發展模式，而該模式在漢語和泰語中的表現差異，正體現漢語量詞系統的歷史長於泰語，因此應是先由漢語發展出量詞再傳給泰語。

首先，基於前述的跨語言研究，我們認為一個量詞系統最原始的階段應該只劃分較大、較抽象的類別，依據很少的語意特徵，如有生性、人類性及各種形狀（DeLancey 1986）。之後，隨著量詞系統的發展，個體量詞的數量開始增加，其所帶的語意特徵也因而增多，所劃分的名詞類別也會越來越細緻，如同我們在泰語演化過程中觀察到的情況。這個個體量詞的誕生與細化的過程，可以視為量詞系統發展的第一階段。<sup>12</sup>

但是，透過這種增加語意特徵以細分類別的方式，恐怕很難得到商周時期那種使用範圍非常狹窄的專用個體量詞。考慮到這個時期的個體量詞幾乎都是用於量化有價物或重要的物品，我們認為這種非常專一的個體量詞應該是在量詞的句法位置已經相對穩定之後，為了這些有價物而特別發明的。這麼做的動機可以從專用個體量詞的語用功能窺知一二。根據 Erbaugh (1986) 的研究，在現代漢語的成人、兒童使用者，以及書面漢語的歷史紀錄中，專用個體量詞的使用場合呈現高度重疊：它們基本上只會用於第一次提及的新事物、非定指名詞、不在眼前的物體，如尚未製造出來、被儲存、被要求提供的物品，或是在歷史性或虛擬陳述中的物件。這些情境的共通點是，收話者並不熟悉發話者指涉的對象，有錯誤理解的可能，因此專用個體量詞有消歧意的功能。這在有價物和重要物品上特別重要，尤其是在數量大的時候，收話者的錯誤理解可能會造成嚴重的損失；而個體量詞的適用範圍越專一，越不容易造成誤解。我們認為商周時期極端的專用個體量詞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如同 Erbaugh (1986) 所述，專用個體量詞在貿易、朝貢、庫存、訂購等場合特別重要，這些經濟活動涉及有價物，但這些物品又往往不在收話者眼前，有誤解的可能。我們另外發現這些活動涉及長距離的互動和社會分工，如貨物的製造和販售，這些通常是在較複雜的社會才會頻繁發生。因此我們假設，極端的專用個體量詞只有在量詞語言使用族群進入複雜社會時才會產生，這可以視為量詞系統發展第二階段的開端。

第二階段產生的專用個體量詞，可能會在隨後逐漸擴展量化的範圍，形成與第一階段相反的演化方向，也就是我們在漢語歷史中觀察到的現象。這樣不斷擴展的可能結果，是產生如現代漢語「個」一樣極端的通用個體量詞：「個」在商代跟「枚」一樣只能量化竹子（Erbaugh 1986），但到了現代，基本上可以量化所有可數名詞（Her & Hsieh 2010），且在口語中出現於所有適用專用個體量詞的語境以外的場合（Erbaugh 1986）。我們認為這種極端通用個體量詞是非常晚近的產物，因為它並不對應任何認知上顯著的類別，也無法像專用個體量詞一樣協助消歧意，因此應該是專用個體量詞經過很長時間的量化範圍擴展過程，最終才能產生。我們可以將極端通用個體量詞的產生，定義為量詞系統發展第三階段的開始。

---

<sup>12</sup> 嚴格說來，個體量詞的誕生可能並不是量詞系統發展的最初階段。基於計量量詞在語意功能上的普遍性，它應該比個體量詞更早產生，並隨後演化成個體量詞（Greenberg 1990 [1972]；DeLancey 1986）。考慮到句法層面上的計量量詞與測量名詞的差異（見註 1），我們認為更準確的演化途徑應該是：一開始所有有數詞的語言都有測量名詞，這時還沒有量詞系統的存在。接著，有些語言將測量名詞這種用於協助數詞量化的名詞語法化成獨立的詞類，即量詞，由此進入了量詞系統發展的最初階段。接下來，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可能為了統一數詞量化可數與不可數名詞時的句法結構，而發明個體量詞，這便進入了我們這邊所說的個體量詞發展的第一階段。

這裡，我們的理論遇到了一個問題：在第二階段，新產生的專用個體量詞理應和第一階段產生並細化的通用個體量詞共存；但我們在漢語歷史上，卻只能觀察到由專用向通用的單向演化趨勢（Erbaugh 1986）。為解釋這個現象，我們認為重要的關鍵是：如同第一節所述，個體量詞具有語意冗餘性，所以省略它並不影響語意（Her 2012）。基於這個事實，我們認為在早期漢語文獻中觀察不到通用個體量詞，可能有兩種原因：

第一，早期漢語文獻為節省書寫材料，省略必要性較低的通用個體量詞，只保留有消歧意功能的專用個體量詞。考慮到現存的商周時期文獻以甲骨文和金文為主，書寫較為不便，這是很合理的做法。待書寫技術較為進步後，人們才逐漸將通用個體量詞也寫入文本，和新誕生的個體量詞一同促成漢語個體量詞數量的增加（李艷芝、吳義誠 2018）。

第二，早期漢語的量詞語法化程度較低，可能在口語裡通用個體量詞就經常省略。Her & Li (2023) 的研究指出類似的現象：北方漢語比起南方漢語更傾向省略個體量詞，如台灣華語通常不允許省略個體量詞，但北京華語很常省略，並將其歸因於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以北方為中心的統治導致的「阿爾泰化」（Altaicization），使北方漢語的量詞系統退化。可以推測，在漢語的量詞系統發展初期，個體量詞還不是語法系統穩定的一部份，因此在沒有消歧意需求的語境中，人們可能傾向直接省略個體量詞，而不是使用通用個體量詞，反映在書面語中便是看不到通用個體量詞的情況。等漢語的量詞系統發展更成熟，個體量詞的使用更穩固、更具有強制性時（Her 2017），它們在書面語中的數量才上升。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假設，漢語在原始漢語（Proto-Sinitic）時期處於第一階段，開始使用量化範圍較大的通用個體量詞，並逐漸細化其分類，類似原始傣語的情況（DeLancey 1986）。到了開始使用書面語的上古漢語（Archaic Chinese；魏培泉 2000），漢語開始進入第二階段，產生許多專用個體量詞，並逐漸擴大其量化範圍。最後，漢語在唐宋時期鞏固了「個」的通用個體量詞地位（Huang 2013），從此進入第三階段。

另一方面，泰語在原始傣語時期也進入了第一階段。接著，泰語的書面語歷史從素可泰王朝時期（Sukhothai Dynasty, 1257-1377）開始，期間整體的量詞演變趨勢似乎是從專用到通用，如 *sen* 原本只能量化毛髮，*sa:i* 原本只能量化帶子、絲線、念珠等長條物，到如今都成為量化柔軟長條物的通用個體量詞（番秀英 2009）。因此，可以確定泰語至少進入了第二階段。<sup>13</sup>不過泰語似乎沒有如「個」一樣的極端通用個體量詞，較接近的是 *ʔan*，它在原始傣語時期和素可泰時期是無生物通用個體量詞，但在現代的量化範圍有所縮小（DeLancey 1986；番秀英 2009）。由此可見，泰語尚未進入第三階段。

基於漢泰二語經歷的量詞系統演變階段數的不同，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漢語的量詞系統比泰語還早產生，經歷比泰語還久的發展時間，因此足以產生極端的通用個體量詞。因此，漢語的量詞系統應該是原生的，而非借自泰語。另一方面，原始傣語中即存在來自漢語的個體量詞 *\*phen* 「片」和 *\*tue/\*due* 「頭」，但並無文獻宣稱任何漢語的個體量詞是來自傣語。

### 三、動物個體量詞：漢泰的周邊語言

<sup>13</sup> 漢語和泰語的書面語歷史，都呈現個體量詞由專用至通用的趨勢，因此文字的發明可能是第二階段開始的標記，也恰好對應社會的複雜化。

除了直接比較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與功能，我們也可以觀察歷史上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的語言，藉由它們的動物個體量詞使用情形，以強化漢語族更早擁有量詞的假說。如果漢語族確實比傣語支更早產生量詞，它應該有更長時間發展複雜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也更有機會影響周邊的語言，使它們也更可能有相對豐富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

為了進行這項比較，我們必須先辨識哪些語言是受了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的。這部分主要參考 Her & Li (2023) 對於亞太地區各語言族群量詞來源的研究，其中日琉語系 (Japonic) 和韓語的量詞系統來自漢語族，南島語系則是在傣語支的影響下產生量詞，苗瑤語系主要是受傣語支影響產生量詞，南亞語系中的不同量詞語言則分別有不同的量詞來源，其中高棉語 (Khmer，或稱柬埔寨語 Cambodian) 的量詞系統來自傣語支，越南語的量詞系統則深受漢語族影響。另一方面，SMATTI 中的藏緬語族和印度-雅利安語支則有非常複雜的量詞來源：藏緬語族在地理上被量詞發達的語言族群包圍，漢語族、侗台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和南亞語系都可能對其造成影響 (Her et al. 2019)；印度-雅利安語支的量詞系統則可能來自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 (Assam state) 周邊的藏緬語族及南亞語系語言，或是屬傣語支的阿洪姆語 (Ahom)。主要分布在印度次大陸南部的達羅毗荼語系 (Dravidian)，其量詞系統則來自與印度-雅利安語支的接觸。

最後，Her & Li (2023) 也猜測分布在亞洲內陸的阿爾泰語言 (Altaic) 沒有原生的量詞系統，其量詞都是出於語言接觸，因為該群體<sup>14</sup>中量詞語言非常少見且分布很分散；但他們沒有討論阿爾泰語言量詞系統的來源。對此，我們參考陳甚安等 (2024) 對阿爾泰量詞語言來源的研究：阿爾泰語言包含突厥語系 (Turkic)、蒙古語系 (Mongolic) 和滿-通古斯語系 (Manchu-Tungus)，<sup>15</sup>其中突厥語系大部分量詞語言受波斯語 (Persian)<sup>16</sup>影響，僅有撒拉語 (Salar) 和西部裕固語 (West Yugur) 是純粹受漢語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蒙古語系和滿-通古斯語系則都是受漢語影響而發展出量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就現階段我們能執行的初步研究而言，可行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從能確定量詞來源是漢語族或傣語支的語言族群，選出代表性的語言，再深入討論並比較其動物個體量詞的使用情形。符合這個條件的語言族群，其量詞系統的主要來源，以及我們所選擇的代表語言如表 (一) 所示，這些語言都是所屬語言族群中較優勢或量詞系統較發達 (陳甚安等 2024) 的成員。表一以外的亞太地區語言族群，其量詞系統來源複雜，甚至可能同時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難以協助判斷哪一方的量詞系統更早產生，我們因此將其排除出本節討論範圍。

表一 受漢語族 / 傣語支影響的量詞語言

語言族群	量詞來源	代表語言
日琉語系	漢語族	日語
韓語	漢語族	韓語

<sup>14</sup> 阿爾泰語言是否構成一個有親緣關係的語系 (language family) 尚有爭議 (陳甚安等 2024)。

<sup>15</sup> 日語和韓語是否屬阿爾泰語言尚有爭議 (陳甚安等 2024)，且如正文所述，其量詞系統的來源已確定是漢語族，因此沒有重複討論的必要。

<sup>16</sup> 波斯語本身的量詞系統來源尚不清楚，可能是印度-雅利安語支 (陳甚安等 2024)。

突厥語系	漢語族	撒拉語
蒙古語系	漢語族	東鄉語
滿-通古斯語系	漢語族	滿語
南亞語系	漢語族	越南語
	傣語支	高棉語
苗瑤語系	傣語支	果雄語
南島語系	傣語支	印尼語

以下各小節分別討論這九個語言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和量化範圍，以證明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的數量是大於受傣語支影響的語言。

### (一) 日語

日語作為日本的通用語，是日琉語系中最優勢的語言。日語和漢語有悠久的接觸史，後者系統性的影響可上溯至公元 400 年左右，日語書面語系統也是於奈良時代（710-794）由漢字改造而來（Shibatani 1990）。直到如今，日語的詞彙和語法系統仍深受漢語影響，包含其數詞與量詞系統（Janhunen 2000）。因此，日語可說是在漢語族對日琉語系量詞系統的影響上，最具代表性的語言。

日語的動物個體量詞發達，根據王維（2015）的研究，日語有多達六個個體量詞能量化動物：「匹（hiki）、頭（tou）、羽（wa）、尾（bi）、喉（kon）、杯（hai）」。不過，「杯」的量化對象主要是魷魚跟船，這應該是以形狀而非有生性為分類標準，因此我們將「杯」排除出動物個體量詞的範圍。剩餘的五個動物個體量詞中，「匹」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對應漢語的「隻」，雖然其量化範圍隨使用者不同而稍有變動，如有些使用者不使用「匹」量化鳥類；「頭」用於大型動物，這用法和漢語相同；「羽」則用於鳥類、兔子、<sup>17</sup>昆蟲等被認為有翅膀的動物<sup>18</sup>；以上三個是日語中常用的動物個體量詞（Downing 1984）。最後兩個動物個體量詞：「尾」只用於量化蝦子，「喉」只用於量化魚（王維 2015），屬於極端的專用個體量詞。

從這些個體量詞的使用情況來看，日語的動物個體量詞和漢語的情形（見第二節（一））相似，不僅數量相對較多，其細分程度也很接近：兩個語言都有通用動物個體量詞（漢語「隻」，日語「匹」）和專用動物個體量詞（漢語「尾」，日語「尾、喉」），以及量化範圍居中的個體量詞；其中漢語和日語都使用「頭」量化大型動物，日語以「羽」量化有翅膀的動物則類似漢語以「條」量化長條形動物，是以動物的身體部位或部分特徵為分類標準。不過漢語還另外用動物的社會功能作為分類標準，即「匹」量化交通工具用動物的情況，這是日語動物個體量詞沒有的情形。綜合以上漢日二語的比較，我們得出日語的動物個體量詞發達程度和漢語相近的結論。

### (二) 韓語

<sup>17</sup> 關於日語以「羽」量化兔子的原因，一種解釋是兔耳跟翅膀形狀相似（飯田朝子 2006）。

<sup>18</sup> 「羽」在日語中是翅膀的意思。見《goo 辭書》，網址：

[https://dictionary.goo.ne.jp/word/%E7%BE%BD\\_%28%E3%81%AF%29/](https://dictionary.goo.ne.jp/word/%E7%BE%BD_%28%E3%81%AF%29/)，瀏覽日期：2025 年 3 月 7 日。

韓語在上古韓語時期（Old Korean，史前時期-11 世紀）的語料極端匱乏，但這時期留下的語料是用漢字表記的，可見漢語的影響已然存在（Chang 1996；朴正九 2025）。韓語有三個動物個體量詞：*mali* 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phil* 和 *twu* 用於量化牛和馬，其中 *phil* 和韓語原生數詞共現，*twu* 則和借自漢語的數詞共現（Martin 1992）。和漢語與日語相比，韓語的動物個體量詞較少；但和本節後面只有一個動物個體量詞的語言相比，韓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仍相對豐富，在功能上也有通用與專用的區分，其動物個體量詞系統的發達程度約和泰語相當（見第二節（一））。

### （三）撒拉語

如第三節開頭所述，突厥語系中只有撒拉語和西部裕固語是主要透過漢語獲得量詞，其中前者的個體量詞數量略多於後者（陳甚安等 2024），因此我們以撒拉語作為突厥語系的代表語言。

撒拉語分布於中國西北地區青海、甘肅等地，其使用者撒拉族於元代從中亞遷至中國（馬偉 2008），因此撒拉語和如今中亞大部分語言一樣屬於突厥語系。但撒拉語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漢語族分布區，因此其量詞系統主要來自與漢語族的接觸（陳甚安等 2024）。林連雲（1985）所列出的撒拉語個體量詞中，只有 *baj* 一詞用於量化牲畜，可見撒拉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並不發達。不過陳甚安等（2024）發現突厥語系量詞語言都有語音形式相似的牲畜個體量詞，其字面語意為「頭」，跟漢語以「頭」做大型動物個體量詞的用法相同。他們因此推測突厥民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居住區域鄰近中國，當時漢語的量詞系統已非常成熟（李艷芝、吳義誠 2018），古突厥語可能在此時從漢語引入量詞，甚至以自身表「頭」的名詞取代直接借自漢語的牲畜個體量詞，顯示量詞系統在當時已是古突厥語語法系統較穩定的一部份。由此可見，雖然撒拉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並不多，但卻反映了來自漢語的長期影響，間接證實漢語量詞系統的長久歷史。

### （四）東鄉語

根據陳甚安等（2024）的研究，蒙古語系中有三個量詞語言：達斡爾語（Daur）、土族語（Monguor）和東鄉語（Dongxiang 或 Santa）。其中達斡爾語的量詞系統同時受漢語和滿語影響，按本節的標準無法作為代表性語言；土族語的量詞系統則非常貧弱，只有明顯來自漢語的 *ge*、*tiao* 兩個個體量詞（陳甚安等 2024）。因此，我們認為東鄉語最能代表漢語在量詞系統方面對蒙古語系造成的影響。

東鄉語主要分布於甘肅。東鄉族在元朝時由蒙古人、中亞人和漢人交流形成（Janhunen 2003），因此東鄉語屬於蒙古語系，但其量詞來自漢語（陳甚安等 2024）。雖然東鄉語有很多原生的個體量詞，以及將原本不是量詞的漢語借詞語法化成個體量詞的例子，顯示東鄉語的量詞系統相對穩定而成熟，但我們在文獻中並沒有找到東鄉語使用動物個體量詞的描述（布和 1985；Lefort 2017）。這顯示東鄉語的量詞系統在這方面並不發達。

### （五）滿語

滿-通古斯語系有三個量詞語言：滿語、鄂溫克語 (Evenki) 及錫伯語 (Xibe) (陳甚安等 2024)。其中鄂溫克語和錫伯語主要分佈於中國東北地區 (胡增益 1986; 李樹蘭、仲謙 1986)，比起漢語，它們的量詞系統受到滿語的影響更大 (陳甚安等 2024)，因此不適合代表漢語對滿-通古斯語系量詞系統的影響。反之，滿語與漢語有長久的互動歷史：滿族的前身女真族消滅北宋，建立金朝，與北方漢人大規模接觸 (陳昭揚 2014)，到了清代更是統治中國近三百年，使滿語深受漢語影響 (劉景憲等 1997)，因此滿語自然成為漢語對滿-通古斯語系量詞影響的代表語言。

滿語確實有著非常發達的量詞系統，不僅數量相對於同語系的鄂溫克語和錫伯語明顯勝出，其個體量詞也基本上都是原生詞，顯示量詞詞類已經完整融入滿語的語法系統，使其能獨力創造量詞，而非單純借用 (陳甚安等 2024)。然而，滿語的動物個體量詞卻十分稀少，文獻中只有量化牲畜的 *uju* 一詞，其字面語意為「頭」，和突厥語系語言的牲畜個體量詞一同印證漢語的影響 (見本節 (三))。

## (六) 越南語

越南語屬於南亞語系底下的越語支 (Vietic)，這個語言族群起源於越南北部的紅河三角洲，這裡在漢代、東晉和唐代曾經歷大規模的漢語使用者移民，對越南語造成深刻的影響。原始越語 (Proto-Vietic) 的構擬不存在個體量詞，學者推斷，越語支的個體量詞應該是更晚才在漢語的影響下產生的 (Alves 2020)。

越南語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 *con*，不過蜜蜂、螞蟻等小昆蟲可以使用通用無生物個體量詞 *cái* 量化。另一方面，*con* 也可以量化一些無生物，如刀、路、船等，甚至是一些人類名詞，如賭徒、商人等 (Hoa 1957)。可見越南語的動物個體量詞雖不發達，但有類似漢語「隻」和泰語 *tua* 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能量化一些不屬於動物範疇的名詞 (見第二節 (二))。

## (七) 高棉語

高棉語民族和泰語民族在地理上十分接近，在歷史上也經歷長達數世紀的政治文化交流，使高棉語深受泰語影響。高棉語跟泰語的量詞共享許多特徵，如其語序都是「名詞-數詞-量詞」；如果納入更多名詞性詞組內的詞類，如「這、那」等指示詞 (demonstrative) 和形容詞，兩個語言的語序仍然相同，為「名詞-形容詞-數詞-量詞-指示詞」。另一方面，泰語的量詞系統明顯比高棉語更成熟穩定，這體現在泰語的量詞在數詞出現的場合是必要的，但高棉語的個體量詞數量很少，因此大部分可數名詞沒有可用的個體量詞，因而可以直接被數詞量化；即使是那些有個體量詞的可數名詞，在非正式口語中往往也會省略個體量詞 (Huffman 1973)。Huffman (1973) 從共時性 (synchronic) 的角度對比，發現沒有文獻報告任何現代傣語支語言缺乏個體量詞，但有些孟-高棉語族 (Mon-Khmer，高棉語和越南語屬之) 語言被確認沒有個體量詞，另一些孟-高棉語的量詞系統則跟高棉語一樣貧弱。從歷時性 (diachronic) 的角度來看，泰語從其書面語歷史的起點——素可泰王朝時期 (見第二節 (四)) 至今，量詞的語序一直是「名詞-數詞-量詞」，但高棉語在上古和中古高棉語 (Old and Middle Khmer) 時期存在兩個量詞語序：

「名詞-數詞-量詞」用於人類名詞，「名詞-量詞-數詞」則用於其他名詞，一直到十八世紀才在泰語的影響下變成穩定的「名詞-數詞-量詞」語序。綜上所述，Huffman (1973) 判斷高棉語的量詞系統是受到泰語的影響而產生的。

動物個體量詞的部分，高棉語在這方面並不發達，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 *kba:l*，能量化大部分動物，同時也能量化書本 (Haiman 2011)，這點和漢語、泰語和越南語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相似 (見本節 (六))。

## (八) 果雄語

苗瑤語系語言主要分布於中國南部和寮國、越南北部的山區 (Her & Li 2023)。步連增 (2011a) 指出在量詞系統方面，侗台語系、苗瑤語系、藏緬語族依序形成一個同心圓結構，越往外量詞系統越貧弱；Her & Li (2023) 因此判斷苗瑤語系的量詞主要是受侗台語系影響而來。關於苗瑤語系的代表語言，我們參考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量詞語言資料庫「世界量詞語言地圖」(World Atlas of Classifier Languages, WACL; Her et al. 2022)，其中我們能找到文獻的苗瑤語系量詞語言中，使用人數最多的是屬於苗語族 (Hmongic) 的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 (Western Xiangxi Miao)，因此我們以它為侗台語系對苗瑤語系量詞系統之影響的代表語言。

苗語族傳統上被分為三個分支：湘西苗語、黔東苗語、川黔滇苗語，湘西苗語再分為東部、西部兩個次方言 (王輔世 1985; Sposato 2015)。但根據楊再彪 (2004, 引自 Sposato 2015) 的研究，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各變體可以互通，但跟東部次方言各變體不能互通；因此，Sposato (2015) 將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視為一個獨立的語言，稱為果雄語 (Xong)。<sup>19</sup>

果雄語的量詞系統相對發達，但卻只有一個能量化動物的個體量詞 *ngonl*，用於量化所有動物。不過嚴格來說，*ngonl* 應該分析為有生物個體量詞而非動物個體量詞，因為它也可以量化人類 (Sposato 2015)。因此，我們的分析是，果雄語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並不發達。

## (九) 印尼語

南島語系的源頭——原始南島語 (Proto-Austronesian) 在現今中國南方與侗台語系語言有過密集接觸，從其獲得了許多語言特徵 (Thurgood 1994)，包含來自傣語支的量詞系統 (Conklin 1981)。印尼語是南島語系量詞語言中最優勢的語言，因為它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印尼的通用語，有超過兩億使用者。<sup>20</sup>然而，印尼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並不豐富，只有 *ekor* 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 (Sneddon 1996)。因此，我們判斷印尼語在動物個體量詞方面並不發達。

---

<sup>19</sup> Sposato (2015) 指出，文獻中常將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稱作果雄語 (Qo-Xiong)，但這嚴格說來是不準確的，因為該詞在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中用來指苗語使用者，而該語言只用 *Xong* 自稱。為求行文流暢及便於讀者理解，本文使用文獻常用名稱中最簡短的「果雄語」稱呼該語言，並在此說明相關細節以供讀者參考。

<sup>20</sup> 見 *Wikipedia*，網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and\\_dependencies\\_by\\_populat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and_dependencies_by_population)，瀏覽日期：2025年3月7日。

## (十) 本節結論

基於以上九個小節的討論，我們將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的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的數量整理成表二。

表二 受漢語族與傣語支影響之量詞語言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

語言族群	量詞來源	代表語言	動物個體量詞數量
日琉語系	漢語族	日語	5
韓語	漢語族	韓語	3
突厥語系	漢語族	撒拉語	1
蒙古語系	漢語族	東鄉語	0
滿-通古斯語系	漢語族	滿語	1
南亞語系	漢語族	越南語	1
	傣語支	高棉語	1
苗瑤語系	傣語支	果雄語	0
南島語系	傣語支	印尼語	1

從表二可以看出，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數量（平均 1.8 個）顯著多於受傣語支影響的量詞語言（平均 0.7 個），平均數量多了將近三倍。另外，從我們前面的討論來看，來自漢語族的量詞系統，其動物個體量詞的功能也分化得更細緻：日語有通用、中等、專用三種量化範圍的動物個體量詞，韓語則有通用和專用動物個體量詞，後者還根據數詞種類有所分化。反之，來自傣語支的量詞系統往往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sup>21</sup>基於這些差異，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漢語族比傣語支更早產生量詞系統，有更多時間能發展其動物個體量詞，並傳遞給鄰近的語言，而那些語言也有更多時間能發展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sup>22</sup>這間接支持亞太地區量詞以漢語族為單一起源的假說。

<sup>21</sup> 但是這些通用動物個體量詞也暗示，這些來自傣語支的量詞系統可能是受外在刺激後，在各自的語言中使用原生的詞發展而來的，也就是註 10 提到的刺激擴散；這使這些語言保留在量詞系統發展的早期階段，會出現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見第二節）。另一方面，受漢語影響但只有一個動物個體量詞的撒拉語和滿語，它們的動物個體量詞只能量化牲畜，這意味著這些牲畜個體量詞可能不是透過量詞系統發展的第一階段——通用個體量詞的分裂形成（見第二節（四）），否則我們應該會看到其他量化非牲畜動物的個體量詞，是和牲畜個體量詞一同從更早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分裂而來。相反地，撒拉語和滿語的牲畜個體量詞更可能是直接借用漢語的牲畜個體量詞「頭」，然後再以各自的原生名詞「頭」取代，這意味著這兩個語言的量詞系統並沒有在自身內部經歷完整的發展過程，其量詞系統的原生性更弱。

<sup>22</sup> 從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更多、分工更細緻的事實，推測這些量詞語言獲得量詞系統的時間更長，因而能發展更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這樣的推論存在一個可能的挑戰：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可能只是借入更多動物個體量詞而已，不代表它們獲得量詞系統的時間更長。針對這個可能性，我們在此以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中，動物個體量詞數量較多的日語和韓語為例討論。

日語的五個動物個體量詞「匹、頭、羽、尾、喉」中，除了「頭」的語音形式和量化範圍都跟漢語「頭」相同，可以視為直接借用外，其他的動物個體量詞都跟漢語量詞有重大差異：日語「匹、尾」雖然和漢語「匹、尾」語音形式相似，但量化對象不同，日語「匹」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漢語「匹」則非常專用，只能量化交通工具用動物；日語「尾」只能量化蝦子，漢語「尾」只能量化魚，其量化範圍沒有重疊。日語「羽、喉」則完全是日語原生的個體量詞，漢語中並不存在語音或語意相似的個體量詞。以上四個量詞「匹、羽、尾、喉」都應分析為日語的原生個體量詞，

#### 四、傣語支的數詞與量詞

以上兩節的討論可確認漢語族的動物個體量詞比傣語支發達，因此支持亞太地區量詞系統漢語起源說。本節將討論一項更關鍵的證據：Her & Li (2023) 提及傣語支中的數詞大部分來自漢語，本節在此基礎上詳細追究傣語支的量詞來源，論證量詞的傳遞方向也應是從漢語傳至傣語，因為量詞系統與數詞在功能上有密不可分的連結。

Her (2012) 指出，量詞和數詞在認知上存在乘法關係，因為乘法的數學意義是「數量的量化」(Stampe 1976)：以某個數量為單位，稱為被乘數 (multiplicand)，隨後計算這個單位的數量，亦即乘數 (multiplier)。這兩者在語言中的對應即是量詞和數詞，因為量詞提供了計數單位，可能是一個特定的數量、不特定的數量、甚至是無法表達為整數的數量；數詞則表達該單位的數量，兩者共同形成一個詞組以量化名詞。因此，量詞可依其作為被乘數的值 (value) 而加以精準地分出次類 (何萬順、林昆翰 2015)，如表三。

表三 量詞的分類

次類	值	舉例
個體量詞	1	固定數值 1 (例如，個、隻、條、本、朵、頂)
計量量詞	-1	M1. 固定數值 $n, n > 1$ (例如，雙 $n=2$ 、打 $n=12$ )
		M2. 非固定數值 $n, n > 1$ (例如，排、組、群、幫)
		M3. 固定非數值 (例如，斤、升、碼、分鐘、元)
		M4. 非固定非數值 (例如，滴、節、份、杯、盤)

量詞的「值」若是數值 1，則是個體量詞，否則就是計量量詞。計量量詞又可再細分成四個次類。固定數值者為 M1，如「一打玫瑰」為 12 朵；非固定數值者為 M2，如「一排汽車」至少是兩三輛。若是固定的重量、長度、時間、金錢等非數值，為 M3，如「一斤米」是固定重量的米；而非固定的非數值是 M4，如「一節甘蔗」是某種長度的甘蔗，可長可短。

而非單純的借詞，因為它們都已被賦予新的功能。由此可見，日語從漢語借入量詞系統後，應當經歷了足夠長的時間，讓它能獨立發展出許多新的動物個體量詞。

另一方面，韓語則有三個動物個體量詞「phil、twu、mali」。其中 mali 從語音形式便能判斷是原生個體量詞，phil 和 twu 則很可能分別來自漢語的「匹、頭」，但兩者都負責計算牛馬 (Shen & Her 2024)，和漢語的對應量詞不同：漢語「匹」只用於計算馬、驢等交通工具用動物，不能計算牛；漢語「頭」在現代不能計算馬，在魏晉南北朝則可以計算所有有生物，但「頭」在漢語歷史上沒有只計算牛馬的時期。因此，phil 和 twu 也應分析成韓語的原生個體量詞，而非單純的借詞。由此觀之，韓語跟日語的情形類似，它們很早就從漢語借入量詞系統，因而有足夠長的時間能獨立發展多個原生的動物個體量詞。

相對於受漢語族影響的日語和韓語，受傣語支影響的高棉語和印尼語，都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雖然其語音結構 kba:l 和 ekor 跟原始傣語的\*tue/\*due 差異甚大，也可以視為原生個體量詞，但從其量化範圍和原始傣語的語源相同來看，高棉語和印尼語都僅僅是借入了動物個體量詞的詞類，但它们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仍維持在最早期的階段，沒有進一步的發展。這個現象的一個可能原因，便是這兩個語言從接觸傣語支並借入量詞系統至今，所經歷的時間相對於日韓語並不長，因而沒有足夠的發展時間能產生更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

換言之，量詞可以視為數詞系統的延伸（Au Yeung 2005）。Her（2012）因此預測，如果一個語言有量詞，代表該語言已將乘法的概念語法化，那乘法概念在語法系統中更典型的體現——乘法數詞（multiplicative numeral）<sup>23</sup>也應該存在於該語言中。這點由 Her et al.（2019）成功驗證：在 Comrie（2013）的世界語言調查中，有 87.8%（172/196）的語言有乘法數詞，但 Her et al.（2019）調查的 219 個 SMATTI 量詞語言（見第一節）全部都有乘法數詞，顯示量詞和乘法數詞的存在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簡而言之，量詞系統的存在依賴乘法數詞的存在。

量詞與乘法數詞的緊密關係也可以從一項語序間的相關性得出：Greenberg（1990 [1978]）發現自然語言的位數詞（numeral base）<sup>24</sup>相對於乘數詞的語序傾向和量詞相對於數詞的語序相同，稱為和諧律（harmonization）。例如漢語是位數詞與量詞都置後的語言，如例(2)所示，而屬尼日-剛果語系（Niger-Congo）的伊比比奧語（Ibibio）則是位數詞與量詞都置前的語言，如例(3)所示，這兩個語言都合乎和諧律。

## (2) 漢語

### a. 乘法數詞（位數詞置後）

「三百」

### b. 數詞-量詞詞組（量詞置後）

「三個」

## (3) 伊比比奧語（Ibibio）

### a. 乘法數詞（位數詞置前；Her 2017）

ikie ita

百 三

「三百」

### b. 數詞-量詞詞組（量詞置前；Greenberg 1990 [1972]）

ákpó ífà kèèt

根 一 木柴

「一根木柴」

Her et al.（2019）在 SMATTI 中驗證了這項和諧律，其研究中 97.3%（213/219）的 SMATTI 量詞語言都遵守和諧律。Allasonnière-Tang & Her（2020）更是在全世界範圍調查了 400 個語言，其中量詞語言遵守和諧律的比例高達 99.1%（108/109）。可見和諧律確實是量詞語言嚴格遵守的規律，同時也意味著量詞系統對乘法數詞的依存：一個沒有乘法數詞的語言是無法發展量詞系統而不違反和諧律的（Her & Li 2023）。

以上研究清楚顯示量詞系統與數詞系統的緊密關聯。這關係產生的一個效應是：如果語言 A 借用了量詞語言 B 的數詞，往往也會借用 B 的量詞；反之，如果量詞語言 A 借用了非量詞語言 B 的數詞，在使用時往往不會使用量詞；但文獻中並未有任何案例是語言 A 借用了語言 B 的數詞，而語言 B 反向借用了語言 A 的量詞（Dékány 2025）。<sup>25</sup>例如第三節（四）提過的土族語，原本沒有量詞，

<sup>23</sup> 如「三百（3×100）」、two thousand（2×1000）等表達乘法關係的數詞。

<sup>24</sup> 乘法數詞中表達被乘數的詞，如「十、百、千」、hundred、thousand、million 等。

<sup>25</sup> 類似的現象應該也存在於數詞系統內：因為乘數詞-位數詞的語意關係和數詞-量詞的語意關係

因此使用原生數詞時不使用量詞，如下面(4a)所示；但它在歷史上從漢語借入了數詞與量詞，因此使用借自漢語的量詞時，也必須使用借自漢語的數詞，如(4b)所示。另一個例子是屬馬雅語系 (Mayan) 的量詞語言喬爾語 (Chol)，它的原生數詞必須搭配量詞使用，如(5a)所示；但它也從西班牙語借入數詞，而這些數詞是不能搭配原生量詞使用的，如(5b)所示。

(4) 土族語 (Monguor) (陳甚安等 2024)

- a. xulunə          nəge  
 葫蘆              一  
 「一個葫蘆」
- b. liang=ge        kong  
 兩=個            人  
 「兩個人」

(5) 喬爾語 (Chol) (Scontras 2022)

- a. cha'-p'ej        tyumuty  
 二-量詞          蛋  
 「兩顆蛋」
- b. nuebe            tyumuty  
 二                  蛋  
 「兩顆蛋」

因為數詞與量詞在詞彙借用的過程中經常是「成套」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可以透過漢語族與傣語支間數詞的借用方向，推測量詞的借用方向。傣語支語言的數詞從 2 到 99 都是從漢語借入 (Suthiwan & Tadmor 2009; Alves 2020)；在這個歷史事實下，說傣語支語言反而輸出量詞到漢語，這是極不可能發生的事。Morev (2000) 提出了一個更合理的可能性：原始傣語約在兩千年前從侗台語系其他語言獨立出來，接著在公元第一千年前半與漢語發生密集接觸，輸入很多漢傣同源詞，包含數詞。當時，漢語主要的量詞語序是和現代泰語相同的「名詞-數詞-量詞」，因此可以合理假設，原始傣語便是在這時引進了漢語的量詞以及該語序，並在逐步發展自己的量詞系統時保持這個語序。<sup>26</sup>

都是乘法關係，兩者還遵守和諧律，可以合理假設兩者相同的語意關係也反映在句法層面，形成相似甚至相同的句法關係。若是如此，同一個數詞量化結構內的數詞與量詞，必須來自同一語言的語法限制，應該也會在同一個乘法數詞裡的乘數詞和位數詞上成立。因此，在華語中說「三百」或是說 three hundred 的接受度都很高，但「\*三 hundred」跟「\*three 百」的接受度就非常低。<sup>26</sup> 準確來說，Morev (2000) 認為只有傣語支的西南傣語分支在公元第一千年前半從漢語輸入量詞和「名詞-數詞-量詞」語序，北傣語分支則更晚才和同屬侗台語系的侗水語支和仡央語支從漢語輸入量詞，當時漢語已經轉用現代的「數詞-量詞-名詞」語序，因此這些語言族群都採用這個語序。換言之，Morev 認為原始傣語並沒有量詞，西南傣語和北傣語分支是在不同時期獲得量詞的。然而，DeLancey (1986) 成功構擬出原始傣語的量詞，因此可能性更高的情況是：原始傣語獨立後確實從漢語獲得量詞和「名詞-數詞-量詞」語序，然後傳承給其後代語言；但因為北傣語分支離中國較近，可能之後又受漢語近期的「數詞-量詞-名詞」語序影響而改變語序；又或者北傣語分支獨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靠近中國的傣語支語言受漢語更近期的語言特徵影響，包含「數詞-量詞-名詞」語序。Morev 指出侗水語支和仡央語支的量詞語序非常穩定，並沒有曾經轉換語序的證據，所以應該是一開始獲得量詞時就使用現今的語序；但他並沒有對北傣語分支的量詞語序穩定性提供任何描述，因此我們這邊建構的理論是有可能成立的。Morev 另外說中傣語分支同時存在兩種量詞語序，可見它正處於從原始傣語語序轉向現代漢語語序的過程，這也提升了

## 五、結 語

本文討論了兩項關於亞太地區量詞系統起源的證據。第一，和許多支持傣語支起源之學者的宣稱不同，漢語不僅存在動物個體量詞，其數量跟分類的細緻程度還勝過泰語，且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的語言也有這種傾向，顯示漢語族應該比傣語支更早產生量詞系統，因而有更多時間發展動物個體量詞並傳播給周邊語言，使它們也有更多時間發展複雜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第二，量詞與數詞有著不可分離的緊密連結，而傣語支大部分的數詞都借自漢語，這使傣語支語言反向輸出量詞給漢語的可能性薄弱，因此可能性更高的推測應是由漢語族獨立產生量詞系統，然後逐步傳給亞太地區所有的量詞語言，包含傣語支語言。

## 引用書目

### 一、近人論著

- 丁邦新 2020 《漢台語同源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 戶內俊介 2024 〈殷商漢語數量表達研究——兼論漢語個體量詞的來源〉，in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6: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hange*, edited by Nohara Masaki (野原将揮), & Ikeda Takumi (池田巧), 145-176.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 王彤偉 2005 〈量詞「頭」源頭淺探〉，《語言科學》4.3: 68-73。
- 王維 2015 「界定日語中的分類詞」，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輔世 1985 《苗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曉燕 2021 〈量詞「隻」的形成及其歷時演變〉，《漢字漢語研究》2021.1: 68-76。
- 布和 1985 《東鄉語和蒙古語》，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朴正九 2025 〈語言類型學視角下的韓語與漢語分類詞探索〉，收入程工、李旭平編，《亞洲語言的量詞：描寫與解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方桂著，丁邦新譯 2011 《比較台語手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First published as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Manoa, H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 李方桂 2015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於《清華學報》1971年第1,2期合刊，頁1-61。)
- 李若暉 2000 〈殷代量詞初探〉，《古漢語研究》2000.2: 79-84。
- 李樹蘭、仲謙 1986 《錫伯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艷芝、吳義誠 2018 〈量名短語有定解讀的共時與歷時考察〉，《台灣語言學期刊》16.2(2018.7): 115-157。
- 步連增 2011a 〈南方民族語言的名詞分類詞和數詞分類詞〉，《民族語文》2011.1: 48-54。

---

北傣語分支在歷史上發生過這種轉換的可能，只是目前的轉換已經完成了。

- 步連增 2011b 〈南方漢語中量詞定指現象來源初探——以桂南平話為例〉，《語言研究》2011.3: 99-106。
- 何萬順、林昆翰 2015 〈分類詞與量詞的區分——以臺灣地區華語為例〉，《漢語學報》2015.4: 56-68。
- 林連雲 1985 《撒拉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胡增益 1986 《鄂溫克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馬偉 2008 〈撒魯爾王朝與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19.1(2008.1): 96-106。
- 張公瑾 1978 〈論漢語及壯侗語族諸語言中的單位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14-30。
- 張頴、王曉哲 2014 〈漢語和東南亞語言個體量詞系統對比及個體量詞教學〉，《海外華文教育》3: 247-261。
- 張慶文、鄧思穎 2014 〈共性與差異：粵方言名詞短語研究〉，《語言暨語言學》15.5: 733-760。
- 陳甚安、唐威洋、梁永平、何萬順 2024 〈阿爾泰語言中分類詞的起源與分佈〉，《中國語言學報》52.2(2024.3): 456-479。
- 陳昭揚 2014 〈略論金朝統治的影響及其歷史地位〉，《歷史教育》20(2014.12): 141-178。
- 梁敏 1983 〈壯侗語族量詞的產生和發展〉，《民族語文》3: 8-16。
- 黃從嘉、李孟璋、徐啟斌、何萬順 2025 〈分類詞在北方漢語中的演變：魏晉南北朝與元朝兩個時期的比較〉，《清華學報》55.4: 613-651。
- 黃載君 1964 〈從甲文、金文量詞的應用，考察漢語量詞的起源與發展〉，《中國語文》6: 432-441。
- 番秀英 2009 「漢語和泰語個體量詞對比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博士論文。
- 飯田朝子 2006 《数え方の辞典》，東京：小学館。網址：[https://japanknowledge.com/articles/kze/column\\_kaz\\_02.html](https://japanknowledge.com/articles/kze/column_kaz_02.html)，瀏覽日期：2025年3月7日。
- 蔣穎 2009 《漢藏語系語言名量詞比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劉景憲、趙阿平、趙金純 1997 《滿語研究通論》，黑龍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
- 魏培泉 2000 〈東漢魏晉南北朝在語法史上的地位〉，《漢學研究》18(2000.12): 199-230。
- Adams, Karen L.**, “The influence of non-Austroasiatic languages on numeral classification in Austroasiatic,” (非南亞語系語言在數詞量化方面對南亞語系語言的影響)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 no.1(1991): 62-81.
- Adams, Karen L., & Conklin, Nancy Faires.** “Toward a theory of natural classification,” (邁向自然分類理論) in *Papers from the 9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edited by Claudia W. Corum, Thomas Cedric Smith-Stark, & Ann Weiser, 1-10.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3.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量詞：名詞分類手段的類型學).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Allasonnière-Tang, Marc (唐威洋), & Her, One-Soon (何萬順)**, “Numeral base, numeral classifier, and noun: Word order harmonization,” (位數詞、量詞與名詞：語序的和諧律)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 no.4(2020): 513-558.

- Alves, Mark**, “Historical Ethnolinguistic Notes on Proto-Austroasiatic and Proto-Vietic Vocabulary in Vietnamese.” (越南語中的原始南亞語和原始越語詞彙的歷史民族語言學註解)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13, no.2 (2020): 13-45.
- Au Yeung, Wai Hoo (歐陽偉豪)**, *An interface program for parameterization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漢語量詞參數化的跨領域研究方案)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 D. dissertation, 2005.
- Behr, Wolfgang**, “Classifiers, lexical tone, determinatives: A look at their emergence and diachrony in Old Chinese and beyond,” (量詞、聲調、限定詞：探討其於上古漢語和後世的產生與演變)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The Diachrony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s’, Wassenaar, 2009.
- Chamberlain, James R.**, “Kra-Dai and the proto-history of South China and Vietnam,” (壯侗語系和南中國與越南的史前時代)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104, no.1 (2016): 27-77.
- Chang, Suk-Jin**, *Korean* (韓語).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6.
- Chen, Yen-ling (陳彥伶)**, “Proto-Ong-Be Initials and Finals,” (原始臨高話的聲母和韻尾)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 (2017): 235-275.
- Cheng, Lisa Lai-Shen (鄭禮珊), & Sybesma, Rint**,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裸名詞，「不完全裸」名詞，以及名詞詞組的結構) *Linguistic Inquiry*, 30, no.4(1999): 509-542.
- Comrie, Bernard**, “Numeral Bases,” (位數詞)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ited by Matthew Dryer, & Martin Haspelmath.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2013. DOI: <http://wals.info/chapter/131>, accessed on 2021/08/06.
- Conklin, Nancy Faires**,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numeral classification in Tai and Austronesian*. (傣語支和南島語系中數詞量化的語意和句法)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 dissertation, 1981.
- Dékány, Éva**, “Review of: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sia and Oceania: Function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書評：《亞太地區的名詞分類系統：功能和歷時視角》)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18, no. 1 (2025): 1-6.
- DeLancey, Scott**, “Toward a history of Tai classifier systems,” (邁向傣語支量詞系統的歷史) in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edited by Colette G. Craig. Amsterdam, 437-45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6.
- Downing, Pamela Ann**, *Japa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A syntactic, semantic, and functional profile*. (日語量詞：句法、語義與功能概述)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1984.
- Erbaugh, Mary S.**, “Taking stock: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oun classifiers historically and in young children,” (回顧總結：漢語名量詞的歷史發展與兒童習得過程) in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edited by Colette G. Craig, 399-4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6.
- Greenberg, Joseph H.**,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量詞與名詞的語法數：關於一個語言類型之產生的問題) in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edited by Keith Denning, & Suzanne Kemmer, 166-19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9(1972), pp.1-39.]

- Greenberg, Joseph H.**, “Studies in numerical systems I: Double numeral systems,” (計數系統研究(一): 雙重數詞系統) in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edited by Keith Denning, & Suzanne Kemmer, 194-20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14(1974), pp.75-89.]
- Greenberg, Joseph H.**, “Generalizations about numeral systems,” (數詞系統的通則) in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edited by Keith Denning, & Suzanne Kemmer, 194-20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irst published in *Universals of the Human Language (Vol. 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49-295.]
- Haiman, John**, “*Cambodian (Khmer)*.” (柬埔寨語(高棉語)) London Oriental and African Language Library, Vol. 1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 Hashimoto, Mantaro**, “The genealogy and the role of the classifier in Sino-Tibetan,” (漢藏語系量詞的系譜與角色)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7(1977): 69-78.
- Her, One-Soon (何萬順)**,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區分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 一個數學視角與其意義) *Lingua*, 122, no.14 (2012): 1668-1691.
- Her, One-Soon (何萬順)**, “Structure of numerals and classifiers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cross-linguistic implications,” (漢語數詞與量詞的結構: 歷史與類型學視角和跨語言涵意)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8, no.1(2017): 26-71.
- Her, One-Soon (何萬順), Hammarström, Harald, & Allasonnière-Tang, Marc (唐威洋)**, “Defining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identifying classifier languages of the world,” (定義量詞並識別世界量詞語言) *Linguistics Vanguard*, 8, no.1(2022): 151-164.
- Her, One-Soon (何萬順), & Hsieh, Chen-Tien (謝禎田)**, “On the Semantic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論漢語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的語意差別)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no.3(2010): 527-551.
- Her, One-Soon (何萬順), & Li, Bing-Tsiung (李孟璋)**, “A singl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hypothesis,” (亞太地區量詞的單一起源: 一個假說) in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sia and Oceania: Function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arc Allasonnière-Tang (唐威洋), & Marcin Kilarski, 113-16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23.
- Her, One-Soon (何萬順), Tang, Marc (唐威洋), & Li, Bing-Tsiung (李孟璋)**, “Word Order of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Numeral Bases: Harmonization by Multiplication,” (量詞與位數詞語序: 乘法中的和諧) *STUF-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72, no.3(2019): 421-452.
- Hoa, Nguyen Dinh**, “Classifiers in Vietnamese,” (越南語的量詞) *WORD*, 13, no.1(1957): 124-152.
- Huang, Shuanfan (黃宣範)**, *Chinese grammar at work* (漢語語法的應用)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 Huffman, Franklin E.**, “Thai and Cambodian: A case of syntactic borrowing?,” (泰語和柬埔寨語: 一個句法借用的例子?)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3, no.4(1973): 488-509.

- Jones, Robert B.**,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的量詞結構)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 no.1(1970): 1-12.
- Janhunen, Juha**, “Grammatical gender from East to West,” (東西方的語法性別) in *Gender in grammar and cognition*, edited by Barbara Unterbeck, & Matti Rissanen, 689-797. Berlin: Mouton deGruyter, 2000.
- Janhunen, Juha**, *The Mongolic Language*(蒙古語系語言) London: Routledge, 2003.
- Jenks, Peter**. *The Hidden Structure of Thai Noun Phrase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Kövecses, Zoltán**,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語言、心智和文化：實用導論)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efort, Julie**,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the Dongxiang language: The emerging category of classifier,” (東鄉語中語言接觸引發的變化：形成中的量詞詞類)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6(2017): 174-193.
- Manomaivibool, Prapin**, “Layers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Thai,” (泰語中漢語借詞的層次) in *Tai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Fang Kuei Li*, edited by Thomas Wilson Gething, Jimmy G. Harris, & Pranee Kullavanijaya, 179-184.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Martin, Samuel E.**, *A Reference Grammar of Kore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Grammar and History of the Korean Language*. (韓語參考語法：韓語語法和歷史的完整指南) Rutland, Vermont & Tokyo, Japa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92.
- Morev, Lev N.**, “Some afterthoughts on classifiers in the Tai languages,” (傣語支量詞的一些補充想法) *Mon-Khmer Studies*, 30(2000): 75-82.
- Ostapirat, Weera**, “Proto-Kra,” (原始仡央語)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1(2000): 1-251.
- Peyraube, Alain**, “Some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fiers,” (關於漢語量詞歷史的一些評論)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3(1991):106-126.
- Shen, Ching-Syuan, & Her, One-Soon**, “Identifying Sortal Classifiers in Kore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24 Seou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SICOL-2024), Kyung Hee University, Seoul, Korea, August 8-9, 2024.
- Shibatani, Masayoshi**, *The Languages of Japan* (日本的語言)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neddon, James Neil**, *Colloquial Jakartan Indonesia* (通俗雅加達印尼語) . Pacific Linguistics, Vol. 581.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6.
- Sposato, Adam Michael**, *A grammar of Xong*(果雄語語法).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Ph.D. dissertation, 2015.
- Stampe, David**, “Cardinal number systems,” (基數詞系統) in *The Proceedings of CLS 12*, edited by Salikoko S. Mufwene, Carol A. Walker, & Sanford B. Steever, 594-609. Chicago, IL: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6.
- Suthiwan, Titima, & Tadmor, Uri**, “Loanwords in Thai,” (泰語中的借詞) in *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Handbook*, edited by Martin Haspelmath, & Uri Tadmor, 599-616.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009.
- Tang, Marc** (唐威洋) , & **Her, One-Soon** (何萬順) , “Insights on the Greenberg-Sanches-Slobin Generalization: Quantitative typological data on classifiers and

plural markers,”(關於格林伯格-桑切斯-斯羅賓通則的洞見：量詞與複數標記的量化類型學資料) *Folia Linguistica*, 53, no.2(2019): 297-331.

**Thomason, Sarah G.**,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語言接觸概論).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Thurgood, Graham**, “Tai-Kadai and Austronesian: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壯侗語系和南島語系：其關係的本質) *Oceanic Linguistics*, 33, no.2(1994): 345-368.

**Wang, Lianqing (王連清)**,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漢語量詞的起源和演變).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Weidert, Alfonso**. “Th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of Newari and its historical Southeast Asian background”. *Kailash: A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11, no.3-4(1984): 185-210.

# On the Controversy over Animal Classifiers in the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Thai,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 Abstract

Among the many classifier languages in Asia-Pacific, whether the initial origin of classifiers is Sinitic or Kra-Dai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 the literature, most Western scholars oppose Sinitic and support Kra-Dai, while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hold the opposite view. Her & Li (2023) examined the six reasons against Sinitic and refuted them one by one, arguing that Northern Chinese is the origin of classifiers. One of the reasons supporting Kra-Dai is that Chinese lacks classifiers that distinguish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presents more evidence supporting Sinitic regarding animal classifiers.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animal-specific classifiers 隻 *zhī*, 頭 *tóu*, 尾 *wěi*, and 匹 *pǐ*, we compare Chinese, Thai, and their surrounding languages. The study verifies that Chinese has the most animal classifiers among these languages and that classifier languages influenced by Chinese have more animal classifiers than those influenced by Tai languages. Therefore, based on this evidence, Sinitic is more likely than Tai as the origin of classifi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new evidence based on numerals. Historically, Tai languages borrowed numerals from Chinese; thus, given the close ties between numerals and classifiers, it is far more likely that Tai also borrowed classifiers from Chinese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Keywords:**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animal classifier, numeral, Chinese, Kra-Dai